



萬金川 佛光大學教授

哲學碩士，現任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曾任南華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並於中華佛學研究所教授梵文與中觀學課程。

研究專長為佛經語言學、佛教思想、佛教文學、佛教文化、佛教經典語文，並擅長梵、漢、藏、巴等佛教經典語文。作品有《龍樹的語言概念》、〈藏地學者的龍樹著作觀〉、〈俱舍論世間品所記有關緣起一詞的辭義對論〉等多篇論文與專著。

本世紀之初，台灣大學以「儒學」與「教育」為研究主軸而成立了所謂「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有關這個機構的成立始末及其運作基本模式，參見 homepage.ntu.edu.tw/~cseacntu_intro.html）。十數年之間，在這個機構主事諸公有力的運籌帷幄之下，透過跨領域的整合型計畫而匯集了海內外各路學者巨大的研究能量，不但定期出版《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並且還陸續發行了將近百種左右以東亞儒學為標榜的研究專書（有關此一機構在「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名目之下所發行的各類主版品，參見 www.eastasia.ntu.edu.tw）。毋庸置疑的，在人力結集與研究能量兩個方面，這個機構所發揮的作用與功能，學界之間有目共睹，在在都堪為人文學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的典範。但是，個人仍然深自認為，以「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為名目，而其研究卻僅僅著眼於東亞的「儒學」與「教育」，這種相當偏頗的知識走向若非主事者的圈地自限，便是其人完全昧於東亞文明的過去與現在。

可以肯定的，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的主事諸公當然並非昧於該一地區的歷史事實與當前現狀。然而，這個重要的學術機構何以摒棄佛教於不顧而但以儒學自限其研究主軸？個人以為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外以下兩端。其一，五四以降，斥宗教為迷信，乃至視其為鴉片，這種過時的觀點似乎仍然恍若幽靈一般潛藏在若干學者之間的意識深處，而使他們憚於正視漢傳佛教曾經對東亞文明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其二，在二〇〇四年教育部同意將宗教研修學院納入高校體制之前，長期以來，此間有關佛教研究的人材培育與知識生產，始終都難

以在正規的學術體制之內取得其合法資格，雖然在高校文史哲相關科系的知識架構裡，從來都不缺乏與佛教有關的課程，但是這些課程的學術身分卻永遠都是敬陪末座或聊備一格，而且往往都處於該一科系知識架構裡可有可無的邊陲地帶。

事實上，正是因為長期以來，在現行的高校學術體制之內，佛教研究的人材養成與知識生產，始終都難以取得合法的培育管道及其知識營造的適當場域，終而使得其人材培養的素質、知識生產的品類乃至其生產規模，在在都無法與其他人文領域的學術現況比肩齊步。常此而往，惡性循環的結果，便是海外學成歸來的佛教學專業人材，若非委身屈就於現有的職缺而學非所用，便是處於「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的求職窘境。在話語權相對低落而知識產能又有所不足的情況下，當人文學界有心之士振臂高呼以「儒學」與「教育」為主軸而擎舉「東亞文明研究」的大纛之際，那些研究佛教的專業學者似乎也只能在一旁黯然束手而毫無對策，雖然他們大體都能深切認識到佛教與東亞文明之間，其實有著千絲萬縷一般的關係。

質言之，在此地高校可以認許的知識領域裡，學者之間所謂的「漢學」，不論它是源自西方的 Sinology，或是 China Studies，似乎都完全摒除了「佛教學」的任何成份，不論此一現代學術分支是源自西方的 Buddhology，或是 Buddhist Studies，乃至出於漢地與東亞傳統裡的佛教義學研究。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可以出版《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東亞近世耶穌會史論集》、

《台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乃至《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一類的研究專書，但是，相對的，該一機構的出版品裡，卻始終無法見到諸如「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佛家思想篇」、「東亞佛教的經典詮釋」、「東亞近世佛教史論集」、「台灣佛教史研究論集」，乃至「鑑真東渡與東亞文化傳播」一類的書物。個人無意於此批評該一機構主事諸公的學術識見，更無意窺伺其意識形態的底蘊；然而，既然標名為「東亞文明研究」，無論如何，站在客觀的學術立場上，便不應該罔顧漢傳佛教對促成東亞文明共同體所產生的各種作用。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至十八日，佛光山與佛光大學、南華大學聯合舉辦了一場主題為「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並在會場宣布即將成立一個院級單位的研究機構——此即目前名為「佛教研究中心」的機構——來著手規劃漢傳佛教的相關研究事宜。並且，稍後在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的揭幕儀式上，星雲大師更表示，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負責成立的「人間佛教研究院」，日後將會協助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而著手重新評估漢傳佛教的普世價值，並還給漢傳佛教一個公道。星雲大師更在講話中指出，佛陀只有一個，期勉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之後，一定要和國際之間的各方學者多所往來，彼此聯誼，攜手完成各項跨領域的合作計畫，共同開創漢傳佛教的光明道路。

稍後不久，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的慈惠法師在台北道場，邀約個人與林鎮國教授共

同商議有關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擬整合型計畫的發展方向，當時在場作陪的還有佛教研究中心的主任謝大寧與副主任陳一標兩位教授。由於林鎮國教授一向都是謹言慎行，而不像我個人自來都好發議論，並且又正值學術休假，心情上自然也就比較輕鬆而悠閒。於是，我便率先向慈惠法師建議，不妨就以《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與《阿彌陀經》等四部漢譯佛典為中心，而著手探討這些漢譯經典對東亞文化各方面的可能影響。然而，就在個人甫一發言完畢，慈惠法師不由分說地就當下表示，要求個人能領銜主持其中的一項整合型計畫，這時候個人才猛然發現自己可能「闖禍」了。以上便是個人日後所以會出面擔任「《維摩經》與東亞文化」整合型計畫主持人的始末。

雖然就個人出面擔任這項整合型計畫的主持人來說，的確事出突然而令人有些措手不及；但是，嘗試透過《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與《阿彌陀經》等四部漢譯佛典，而著手探討這些漢譯經典對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到底產生了何種可能的促進作用，則決非個人的臨時起意。毫無疑問的，儒家的「四書」是構成東亞文化共同體的主要成素之一。關於這一點，在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所出版的《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上下兩冊、《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以及《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一類的著作裡都已經有了極其詳盡的論述。然而，東亞文化共同體裡面的佛教成素，也同樣顯而易見，譬如東亞地區古來的佛寺廣布便遠遠超過該一地區孔廟的數目，但是這些東亞文化的佛教成素卻始終未曾受

到學者之間應有的關注。個人深自認為，就東亞文化圈的整體理解而言，若是缺乏了儒、佛並觀的知識視野，或許任誰都無法真正窺見此一文化共同體的全豹！

在浩浩三藏之中，擇取《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與《阿彌陀經》等四部漢譯佛典，而嘗試論究它們對東亞文化共同體的促進作用，這當然不是一己的隨興之舉而已。事實上，這種選定還是有其一定理據的。

首先，從文獻學的立場來看，這四部漢譯經典目前都各自有它們的梵文原典與藏文譯本存世；因此，透過「跨語種」乃至「跨文本」的文獻學對勘，也最容易見出漢譯文本的特色所在。

其次，就漢地譯經史的立場來看，《阿彌陀經》有兩個同本異譯，《法華經》與《維摩經》各有三個同本異譯，《金剛經》則有六個同本異譯，而這四部經典的重譯現象也恰恰可以說明它們在漢地佛教的發展進程裡始終都一直受到重視。

其三，從經典注釋史的立場來看，除《維摩經》未見任何印度注釋書留傳，其餘三者都有其印度注釋書存世；由此可見，它們在印度佛教中也同樣受人矚目。而前揭四部經典在東亞佛教圈裡的注釋書，更是汗牛，而這種族繁不及備載的注釋書現象也充分反映出它們在東亞地區曾經被再三細加精讀的實際狀況。

其四，從經卷供養而求取功德的立場來看，敦煌石室寫經之中，這四部經典的寫卷數量

更是高居前四，並且這些經卷的寫經題記也充分反映出前揭四部經典在漢地佛教裡是相當富於宗教魅力的。

其五，從漢傳佛教思想發展的立場來看，《法華經》、《金剛經》與《阿彌陀經》這三部經典，分別與天台宗、南宗禪以及淨土宗的成立，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至於《維摩經》，該一經典雖然並未直接開立漢地的佛教宗派，但是維摩其人的生動形象則始終影響了中國居士佛教的發展樣態。

基於以上這些理由，我們若是能夠把前揭《維摩經》等四部在中土長期流行的經典合稱為漢傳佛教的「四書」，或許可以藉此而更進一步聚焦於東亞文化共同體裡的那些佛教成素。然而，佛教的「四書」，究竟在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形構過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呢？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擬訂這項整合型計畫而準備詳加探討的核心議題之一。

由於《維摩經》的梵文原典上個世紀末才在西藏拉薩布達拉宮甫告發現，而其梵藏漢三語對照的文本二〇〇四年經由日本大正大學刊行之後，便立即吸引了國際學界的研究目光。因此，個人在領受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慈惠法師的錯愛之餘，便隨順此一學術熱潮而在二〇一三年六月開始籌畫有關「《維摩經》與東亞文化」的整合型研究計畫。既然名之為「整合型」，這便意味著這項計畫雖然聚焦在《維摩經》這部人間性極強的佛教文本上面，但卻準備採取跨領域的多元性觀照方式來研究這個饒富意趣的佛教文本。

此外，就《維摩經》的影響層面而言，則不僅及於漢地佛教思想的發展，而且更遍及中土的文學、藝術乃至士人的精神生活。經中文殊問疾、天女散花、請飯香土、手接大千之類的場面，機鋒處處而膾炙人口，終而使得這部經典日後成為了胡適先生口中所謂「半小說、半戲劇」的文學作品。事實上，這部經典不但深受六朝清談名士與歷代文人的喜愛，其後經中的若干情節不但發展為說唱文學的講經變文，而維摩居士的形象乃至經中那些張力十足的戲劇性場面，也成為了中國畫家喜於描繪的變相圖景。因此，除了佛教學專業的學者之外，邀集中國文學與佛教藝術方面的專家參與這項整合型的研究計畫，也勢在必行。

在與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陳一標教授商討之後，便初步擬訂了一項為期三年的計畫，而分別從文獻、歷史、思想、文學、藝術、文化等各個領域，全面性地來研究這部經典的內容及其與東亞文化的關係，並且也大體規劃出以下六個研究方向：

- 一、梵文《維摩經》的相關研究。
- 二、支謙、羅什與玄奘三個漢譯本與西藏譯本的校勘、標點及其相關研究。
- 三、《維摩經》相關注釋的研究：僧肇、智顛、吉藏、窺基，乃至宋元以降的注釋文獻。
- 四、《維摩經》敦煌講經文、經變圖研究。
- 五、《維摩經》對中國思想、文學、藝術，乃至士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影響。
- 六、《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形構。

其後，由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發出正式邀請函，並且在陳一標教授的極力奔走之下，終於在二〇一三年九月確立以下七項子計畫並於二〇一四年九月提出初步的研究報告：

子計畫一：《維摩經》梵藏漢文本對讀與校勘。

子計畫二：《維摩經》的敦煌寫卷與日本寫經及其週邊。

子計畫三：《維摩經》與中國文學。

子計畫四：《維摩經》與中國藝術。

子計畫五：《維摩經》與六朝佛教。

子計畫六：《維摩經》與隋唐佛教。

子計畫七：《維摩經》與宋元明清佛教。

此外，為了加強整體計畫的橫向聯繫而使各項子計畫之間可以起到彼此相互支援的效果，子計畫負責人每月定期集會並輪番報告其研究概況。二〇一三年九月一日至三日，我們先後在高雄佛光山與宜蘭佛光大學兩地如期召開了首屆「《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除了各項子計畫負責人提交其研究報告之外，同時並有與會的中外學者發表了將近二十篇的相關論文，內容則遍及《維摩經》的語言與文獻、思想與文化以及文學與藝術等等方面。

在這次研討會籌備期間，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的妙凡法師曾經向個人詢問有關會議

研討主題的設定問題，而建議主辦單位是否可將人間佛教的相關議題列入研討項目。個人則回覆妙凡法師說，從一開始有關佛教四書的選擇，並嘗試探究它們與東亞文化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乃至以《維摩經》這部人間性極強的經典作為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的起點，在這些抉擇的背後，其實就是企圖在佛教學術的相關研究上能夠進一步落實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因此，這整個研討會的努力方向可以說就是一種人間佛教的學術落實，所以似乎就沒有必要再特設一組議題來討論它。個人深自以為，在佛光山教團長期的努力耕耘之下，大師人間佛教理念的落實在各方各方面都有頗為可觀的具體成果，而在糾集佛教學術人力以弘揚漢傳佛教方面，雖然也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但顯然還是有可以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事實上，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其目的便是希望在這一方面能夠匯集學者之間的研究專才與研究能量，而共同攜手於漢傳佛教人間性表現的整合性研究。

個人以為，不論是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積極推動的跨領域整合型計畫，或是由該一中心籌辦的「《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基本上都是秉持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而著手運作的，譬如在《維摩經》的研究方面，我們的整合型計畫就沒有把這部經典僅僅侷限在佛教的內部而只著眼於該經之中的義理探索，而是把它擺放在中國文化的具體情境乃至東亞文明的整體脈絡上來加以看待。我們的整合型計畫所以會採取這種方式來觀照《維摩經》，其實並不代表這部膾炙人口的經典在義理上不值得深入研究，而是認為經中飽

含智慧的抽象義理若是能夠藉由廣泛的文學、藝術乃至文化層面上的各種具體表現來加以探索，或許可以讓人們更加明白佛教經典的人間性格，以及星雲大師一生推動人間佛教的苦心。

當然，由於對日本與南韓學界相關研究的學術信息所知相當有限，因此，原先規劃中準備邀約對這兩個佛教傳統裡的《維摩經》有所研究的學者參與這次的國際研討會，而最終還是難以實現，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我們希望今年的研討會能夠有機會彌補這項不應該出現的缺失。總而言之，藉由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我們由衷期盼該一中心的主事者能夠繼續秉持星雲大師在揭幕儀式上的指示，首先是糾集此間流散在主流學術之外的佛教研究者，讓他們有一個可以協同研究的工作平台，其次是加強華人地區乃至國際之間佛教研究者彼此的學術聯誼。

以上是個人主持「《維摩經》與東亞文化整合型計畫」一年多以來的工作報告，以及個人的一點期盼，希望各位多多指教，謝謝！



「人能私道，非道私人」，
唯有以教育培養人才，
才能成就佛教事業，
達到普濟群生的功能，
而讓佛光普照全世界。

—
《星雲日記》